

从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看“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几个基本特点

赵心愚^①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学概念。针对按民族为单位一个个分别进行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研究要注意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去客观把握，并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②。所谓“藏彝走廊”，即费孝通先生经过宏观思考后具体提出的8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之一^③。

费孝通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对“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讲得十分清楚。他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④ 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这一概念已20多年，这20多年正是我国民族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一些学者对“藏彝走

①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兼职教授。

②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③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著《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廊”的地理范围、走廊内的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文化活动及民族迁徙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关藏缅语族各语支民族之间历史关系和相互影响的新见解，对整个走廊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深化。尽管有关研究取得了这样的发展，但在不少方面仍存在明显探讨不够的问题。本文拟就“藏彝走廊”内古代通道问题略陈管见，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藏彝走廊”以康定为中心，整个走廊大体北起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中经川西、藏东及滇西北高原，南至西藏东南部，多处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分析这一地区的已有的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和有限的史籍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藏彝走廊”古代通道存在着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藏彝走廊”古代通道首先值得注意的基本特点是数量较多。所谓数量较多，是指走廊内的古代通道绝不是一条或几条，而应是纵横交错有若干条。正是由于存在众多的古代通道，东起青海东部，南至西藏东南部这一广大地区才成为一大民族走廊。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自河湟地区南迁的古羌人与西南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有关。但是，过去人们在谈及古羌人南迁路线时，多只提到自河湟到岷江，又西到大渡河，然后再到雅砻江下游及云南北部等地的路线，其他路线则不谈，似乎通道只有这一条，河湟地区的古羌人也只通过这一通道才最后到达西南地区，这在纳西族先民迁徙路线的研究中尤为突出^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史籍中这一通道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记载，且岷江上游距河湟地区较近，考古发掘又较早。实际上，除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开

^①在纳西族先民迁徙路线的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方国瑜先生提出的岷江—大渡河路线，《纳西族简史》全面采用了这一观点。参见《纳西族简史》第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展调查获得的民族学资料外，仔细分析有关史籍中有限的记载，仍可发现有其他通道存在的可能。

《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氐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赐支河”即《禹贡》中的“析支”；“西数千里”，实指今青海南部至西藏东北部这一广大地区。根据这一记载，武都羌、广汉羌可能确是经岷江流域等迁徙的，而越嶲羌则可能是由岷江上游又西到大渡河流域再南下的。但问题在于，《后汉书·西羌传》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将南迁羌人都详细记载下来。从青海南部西迁到西藏东北部这一广大地区的古羌人难道就不再南迁了吗？从游牧民族的活动规律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从史籍中有限的记载来分析，其他通道的存在是极有可能的。

根据文献记载再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可以认为从河湟地区经青海南部到西藏东北部，换言之也就是在“藏彝走廊”的北面应有着不少重要的古代通道，一些古羌人先后经这些通道往西迁徙，其中的一些在西迁后又从青海南部、藏东北地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甚至怒江的上游或源头地区由北往南沿流域迁徙。这些迁徙路线，都应是“藏彝走廊”中重要的古代通道。

童恩正、李绍明、张增祺诸先生均认为川滇西部石棺葬与纳西族等民族的先民有着渊源关系。分析几大江河流域石棺葬考古资料，可以认为南迁的古羌人南下进入大渡河流域后（有从岷江流域西进的，也可能有从大渡河源头地区南下的），有的又向西翻



越折多山等分水岭进入雅砻江流域，由雅砻江流域向西翻越雀儿山等分水岭进入金沙江流域，甚至再向西进入澜沧江流域。同样，也有的南迁古羌人后又由西向东跨流域迁徙，或由澜沧江流域进入金沙江流域，或由金沙江流域进入雅砻江流域，甚至由雅砻江流域到大渡河、岷江流域^①。总之，几大江河间也有众多交通线，构成了跨流域的横向的（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众多古代通道。几大江河流域间石棺葬文化存在的不少共同点，十分有力地证明“藏彝走廊”内这些横向古代通道的存在^②。

“藏彝走廊”内出现数量较多的古代通道与这一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这一走廊所处地区总的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区域内不但山多，而且河流多，呈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态势。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几大江河及众多支流的河谷与无数的山口，均成为古代不同民族及部落间相互往来或迁徙的天然孔道，无数交通线由此逐渐出现。古代民族、部落通过这些交通线长期往来，走廊中纵横交错的一条条古代通道便因此形成。

分析西南一些民族的民间传说及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纵横交错的古代通道中，纵向的也就是南北向的通道更显得重要，其发挥的作用也更大，这是“藏彝走廊”内古代通道值得注意的第二个基本特点。

在西南一些民族的传说和送魂路线中，都提到祖先原居住在北方，后才沿江河往南迁徙。如普米族老人去世后，灵魂要送回

^①在这一地区一些民族的传说中，明确提到其先民有过这种跨流域的活动。参见：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云南少数民族民族风俗志·普米族》，《思想战线》编辑部1981年编印。

^②几大江河流域石棺葬文化的共同点，参见：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葬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李绍明《康南石板葬族属初探》，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张增祺《“摩沙”源流考略》，载《云南文物》第22期，1987年。



祖先居住地。在普米族的送魂诗中，祖先是从昆仑山南下，顺雅砻江往南迁徙，最后到达今川滇交界地区的泸沽湖^①。怒族现主要分布在怒江峡谷地区，按其习俗，怒族男子去世后也要将魂送到祖先居住地。在怒族的送魂词中，祖先是从澜沧江下游顺江南迁的，至兰坪一带后，再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流域^②。景颇族与普米族、怒族一样，老人去世后灵魂亦送回祖先居住地，景颇语称作“本砣省腊崩”（意为天然平顶山）。在其送魂词中，可看到祖先来自澜沧江、怒江的源头地区，换言之，即青藏高原的上部，迁往南方也是沿江而下的^③。丽江纳西族一直流传着“多弥”传说，称祖先原来居住在北方高原上一个名叫“多弥”的地方，后沿金沙江等河谷往南迁徙，最后到达丽江^④。纳西族的葬俗与普米族、怒族有相似之处，人去世后其灵魂也要送回祖先原居住地，送魂路线实际上就是先民迁徙路线。今云南巨甸地区的纳西族送魂路线是沿金沙江而上，一直到四川巴塘一带，尽管再往北已缺，但基本走向和沿江迁徙很明确，与“多弥”传说也基本一致^⑤。在云南一些地区的彝族中，也有祖先居住在北方及沿河流南迁的口传历史^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与河流有关的迁徙传说在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分析石棺葬考古资料即可发现，众多的石棺葬群多分布在几大河流及支流两岸的台地上，远离河

①《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普米族》，《思想战线》编辑部1981年编印。

②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

③龚庆进：《景颇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景颇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铅印本，第10～12页。

④参见李绍明著《康南石板葬族属初探》，载《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笔者2001年在丽江纳西族中进行调查时，也听到了这一传说。

⑤转自郭大烈、和志武著《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⑥参见易谋远著《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3页。



发现后，有学者认为，蜀族沿岷江而下，也就是经过这一古代通道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①。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蜀人进入成都平原表明当时这一通道是畅通的，人们可由北往南经这一通道活动。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藏彝走廊”中这一重要通道后来出现重大变化，之后再南下的古代民族已不能沿这一通道进入平原地区。这种变化的出现显然不是由于自然条件出现变化，应是与蜀族的发展及之后秦经营巴蜀的活动有关，尤其是秦的势力进入成都平原，使古代民族再沿这一通道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不再可能。这一通道南端受阻后，继续南迁的古羌人到达今四川茂县、汶川一带后便折向西，一些部落沿杂谷脑河到今理县一带，有的再往西进入大渡河流域。这一变化出现后，这条通道的地位、作用也就相应出现了变化，这也可能是其他纵向通道形成及发展的原因之一。当然，其他几条纵向通道的形成、发展当主要与青藏高原上古代民族的活动及后来汉藏民族势力的拓展有关。

分析西南地区一些民族的民间传说、送魂路线及石棺葬考古资料，可以认为几大河流间跨流域的东西向古代通道的变化也应与走廊内部古代民族的活动有关。如前已言及的普米族的送魂路线中，说祖先从昆仑山下来后，最初是沿雅砻江南下，但中途一度改变了方向，往东到了大渡河流域，后又折回来，最后才到达泸沽湖。为什么迁徙途中会出现这样大的方向路线变化？有理由认为是中途遇到了较强的部落阻拦，不得不改变方向翻越山口，过分水岭进入大渡河流域，后又返回雅砻江流域也可能是由于同

^①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样的原因。前已言及的怒族送魂路线中，先是沿澜沧江南下，后翻越碧罗雪山到了怒江流域，也可能是遇到了强敌。又如，永宁纳日人（纳西族的一支）除“胡尔”外的几个“尔”（指血缘集团），其祖先之所以在传说的迁徙途中走弯路，路标损坏只是一形象说法，当也与当时民族部落间的对抗有关，走弯路是这种形势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①。再如，纳西族东巴经中有一部称《东埃术埃》，直译为《东术仇杀》，现多译为《黑白战争》，一般认为描写的是纳西族古代部落间的战争^②。结合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石棺葬分布及纳西族送魂路线等分析，可以认为两大流域间一些古代通道的变化与这种同一古代民族内的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也有关。由于强敌挡道，有的部落只得跨流域迁徙，开辟新的交通线，翻山越岭到另一地区去寻找生存空间。尽管文献中缺乏这方面记载，但有理由认为，这种不同支系部落间的冲突应不少，因而由此出现的跨流域迁徙也就十分频繁。这些频繁的跨流域的迁徙活动，催生了不少新的交通线，应是东西向古代通道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战争、冲突引起跨流域迁徙活动外，还有与古代民族部落间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有关的跨流域活动。任乃强先生曾专门论述食盐引起的古代民族间的跨地区活动，这种活动涉及的面并不小^③。尽管这种跨流域活动规模要小于整个或若干个部落的集体迁徙，但其持续的时间却相当长。当民族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与交换有关的跨流域活动路线也相应变化，因而这也应是东西

①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②《纳西族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68页。

③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向古代通道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由于古代民族及部落间的情况不断变化，导致“藏彝走廊”内的古代通道也不断变化，一些通道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十分重要，但后来却无关紧要了，甚至被人们遗弃、忘却，而另一些通道原本不太重要，后却发展成为重要通道。

“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特点应很多，但笔者认为最基本的应有这三个。这三个特点之所以称作基本特点，是因为它是随这一民族走廊的形成而出现的，并且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

石 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蒙 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